

文化研究及其他

黄卓越专题文集



黄卓越

著

Cultural Studies
and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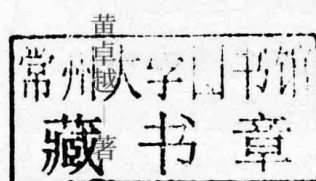
张一信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文化研究及其他

黄卓越专题文集

CULTURAL STUDIES
AND OTHERS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研究及其他: 黄卓越专题文集: 汉、英 / 黄卓越著.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 7-5001-5660-4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文化研究—文集—汉、
英 IV. ①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18438号

出版发行: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010) 68359376; 68359827 (发行部); 53601537 (编辑部)

传 真: (010) 68357870

邮 编: 100044

电子邮箱: book@ctph.com.cn

网 址: <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 张高里

策划编辑: 胡晓凯

责任编辑: 胡晓凯 范祥镇

装帧设计: 潘 峰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67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

ISBN 978- 7- 5001- 5660- 4

定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自叙

在中国的学术分科中，并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一般的提法都会将之与政治、经济等并列，可知其属于一更大的门类，难以为之独立设目。当然，“文化”也会渗透于几乎所有的学科中，如想象性地将这些成分抽取出来，并排列为一组具有相对同质性的序列的话，那么便会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十分广袤、甚至无尽连绵的天际线。文化之泛化状况由此可知。

此外，还有一种被特称为“当代文化研究”的概念，需要被单独提出来讨论。这一类的研究当然也带有知识学的属性，然而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往往携有思想探索与论辩的特征，学者们借之，主要也是为了解答、回应其时遭遇的生存与知识等的重大问题，即属于“问题式”（problematic）的。以之反顾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大致可以看到几组按时间排序的“波动”或“潮浪”，正是它们的起伏变化，构成了几十年来文化思想演进的一个清晰可辨的图谱。第一波约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些学者也以“文化热”这一称名通述之，虽然未必就很准确，但正是有籍于此，使“文化”这一概念以前所未有的魅力闯入了当代学人的眼睑。然后是从 90 年代初期始，“文化”作为“问题”再次引动了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这固然与社会的转型及知识界本身的分化等均有关系，在诸如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名义下，“文化”超越学科的界限而成为各种立场表述各自社会情怀的一

个广阔平台。而不久之后，或许也为大多数人所始料未及，另一种潮流已隐然抵达，并至新世纪之交浮出脊背，渐次酿成一声势更大的学术与思想浪潮，这就是一般所称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此文化研究当然不同于彼文化研究，相比于前两波走势而言，其更备有知识学的盔甲（因此非经专门化训练的学者已难以涉入），同时也将“问题式”的探测更推向一种“深描”的层次，并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我们旧有的学术形态、话语方式。直至今日，仍未见有另一种有关“文化”的研究可以轻易取替它的地位。

关于“文化研究”的内涵与意义，及其为何会在中国知识界造成如此深刻的影响，等等，前后已经有不少相关的论述，似无须在此费言。每一位介入者也都有自己特殊的切入点、观照点，由此也在这一路径的铺陈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研究，不可一概而论。以我自己的情况而言，可能很大程度上与早年的学术习惯有关，会更更多地将对理论谱系的梳理与阐发上。这种操持方式在价值上或与直接针对中国文化状态发声的那些研究不太好比似，似乎保留了更多的“学究”之气，但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如稍作阐发，那么最主要的一点，便是试图通过对这一输入谱系各环节的梳理，去发现一套理论、一组概念是如何与确定的语境关联在一起的，并能借之强势升起，这当然也会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在新的语境中对之挪用的合适性、切用性。从更为绵长的学术史与理论史进程看，一种话语模式的成功上位并取代了之前那些流行甚广的各种旧学，个中原因也值得格外关注，而通过比较去探明新范型的出现究竟有哪些理念上、学理上、方法上的优势，也可使我们在整个治学过程中不至于陷入智力上的疲弱或盲从。此外，既然文化研究已在90年代之后扩展成一种广泛的国际性的话语，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局促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而是应当在与外部话语世界的对接中与之展开充分的对话，并传递出来自于中国的声音，进而在国际文化研究的场域中确立自我的身份。这也同样需要加深对各种既有理论的了解，熟悉其模式的特征与来龙去脉等，而非只是凭借某种简陋的冲动，对之做些浮皮潦草的解知。

除此之外，我也曾根据源自于现实的感触，做过若干基于本土问题的研究，即业内所称的“做文化研究”，程度不同地留下了一些“操斧伐柯”的痕迹。

回顾这些年来参与这一话题的经历，有许多可述者。从最初在课堂上发布个人的研究体会，到后来组织跨年度的“国际文化研究论坛”，引入多位英美与其他多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至北京与中国的学术同仁切磋、交流，或只身漂洋，或携年轻的学子们一起赴英伦探学，各种的把袂论文，彻夜颺言，不知其倦，不知所归……许多情景如在眼前。撰述不算太勤，似也有一些尚可自许者。前些时候，承蒙几位学友的提醒，以为可将自己既已布世的那些单篇文章等哀辑成册，以备记忆或便于翻检，才有心开始注意此事。于是乎搜罗散佚，遴选可观，形成目前的这本专题性的个人文集。

辑入本书的这些文字（包括访谈与序言），主要含有断续写成的有关文化研究，尤其是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锁研心得，以及由此扩展出的结合若干具例所做的研究。以系脉或线索的梳理为主的那些篇章，尽管对象是现成的，但基本上还是根据国内学术展开的需要，并从我自己所获的问题视角切入的，同时也经过了对材料的一个融通过程。这也是在中国治理西学的一个特点，即要求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寻找问题，以使这种疏解式的研究能够成为一次新的发现之旅，这也包括在材料处理上需要比较彻底地“嚼化”原著中的“硬梗”或“坚块”，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流畅地表达出来。至于应用式的一些撰写，也非只是将原有的理论或概念简单地移入另一个场景，而是随时要探察深层语境中存在的差异，以便据之重新修订理论与概念的内涵，移动描述的方向，得出新的论断。

在编辑这部专集的过程中，我也借机重读了一些过去的文章，深感当代文化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那些文化史的考述。此类研究往往都会依托一个具体可以落实的情境，无论是理论上的言述还是针对事实的讨论，最后成形的文本都会在明里或暗中指向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即与写作时的特定背景有密切的关联。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初情境

已然消失或发生了转换，但文本与历史的勾连却依然存在。因此，当我们再次阅读这些篇章时，就需要有一种明确的逆行式意识，以便回溯到过往的场景之中去理解之，而非在其中寻找一般性、常态性的结论。尽管有些论述对于未来的研究还会有所启示，但毋宁将之视为一种学术史的“遗存”。当然，留下的这些文字也不是符码的枯燥堆积，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之的撰写也属于个体跃跃欲试的“思维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可看做是某种活力的结晶，因此，至少就我自己而言，凭借这些“遗存”，在已趋冷却的文字表象之下，仍然能够触及当时散发出的一些心智上的温热。

我的有关文化研究史的系统性著作，将会在另外一个文本中展示，它与本书的内容并不重合。本辑也收入了少许泛文化研究的篇章，及我稍早撰写的几篇其他主题的书序。书题中有“其他”一语，即此谓也。有两篇发表在外刊上的有关文化研究的英文论文因受到外方版权上的限制，不可能将之再转化为汉字了，也顺便列入其中。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译社社长张高里的积极支持与推动，责任编辑胡晓凯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热心并十分尽职的编辑，这次的出版，也由她出面打理，付出了许多心血，一并记之，并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黄卓越

戊戌年春尽时于京城

目 录

“文化”的第三种定义 / 1

离合之旅：文化研究 VS 文学研究

——基于一种历史系脉的考察 / 19

以方法为中心：再识文化研究 / 36

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访谈录）/ 57

知识左翼的进路：移动的谱系

——斯图亚特·霍尔 80 寿叙 / 91

斯图亚特·霍尔的遗产 / 109

文化研究：追忆与讨论

——在伦敦访斯图亚特·霍尔 / 120

面对青少年教育：历史、概念及借用 / 135

博客的“写作”与公共空间的私人化问题 / 148

批评的转轨：语域与困境 / 170

儒学的后问题意识（三题）/ 179

身份防御与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面向 / 189

《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序 / 194

《斯图亚特·霍尔文集》前言 / 199

《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缘说 / 211

张文瑜《殖民旅行研究：跨域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序说 / 215

段慧《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书序 / 220

孙勇《CCCS 的媒介研究》序言 / 225

崔秀霞《徐祯卿诗学思想研究》序 / 230

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序 / 234

徐慧《祝允明文学思想研究》导言 / 238

《东筴西篱第一枝》前叙

——为荷兰中西文化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所撰 / 243

爱情乌托邦的重建之路

——为卢雅娟小说《温州情事》代序 / 248

米格尔张：地中海岸的中国雅士

——为台湾版《春风料峭二月风》所撰序 / 252

Entering into the Expressway of Cultural Studies: Practices in China / 256

The Disenchantment of Discourse and the Tendency of “Developmentalism” / 271

“文化”的第三种定义

当代英美文化研究是 20 世纪下半期以来，继法国结构主义 / 后结构主义之后，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最为重大影响的一种思潮或观念类型，也对诸多的分支学科，尤其是对文学、社会学、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原有模式与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从一种宏观的视野上来看，如在暂不计较诸多过渡、重叠、缠绕、脱位等情形以及地域性不平衡的前提下，似也可尝试将整个国际学术的发展概述为三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古典时期的学术，大致上可以“朴素的实证主义”称呼之（有时也含有宗教、神话等思维的渗入）；19 世纪始遂进入现代学术时期，其主要的标志便是科范化、科系化的建制与“科学主义”信仰的出现并成为主流；至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由于逐渐累积的动能，一种以泛学科与“建构主义”为特征的新的学术范型开始流行，并引领了整个国际学术的逐浪推进，也可将之称为是一种“后学科”（Post-discipline）的思潮。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出现，不仅给这一思潮的演化注入了强劲的助力，也为新的学术样式的形塑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范例。

为适应自身学科转换，国内学界近几年已开始对之有所介绍与研究

探，并有不少成果发表。然至今为止，尚有一些核心问题并未过多触及，试举一例，比如就我们目前所述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言，这个标目中的“文化”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不去刻意求索这一或许难以缚定的答案，只要做自己心目中的“文化研究”就可以了，但这仅仅还属经验层面上的一种敷衍，也无法由此而对新的学术转型有深入的窥知，进而在一个话语分享的层面上与国际学术接轨或展开有效的对话。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就此入手，对这一业已提出的问题做一解答。

当然，并不存在着一个现成而简易的答案。这是因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化研究”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浇筑在一个无法移动的意义模型之中了。比如，以上世纪 50 年代正式确立的文化研究而言，其所使用的“文化”概念，便是由更早期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发展而来的，一方面，后来所使用的“文化”这一词语并没有变，而是直接采用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文化批评中既有的同一个概念；另一方面，定义的“句式”却发生了变化，由于大量新的内涵被攫来充斥其间，也就造成了概念的大幅度移位。总体来看，这种变与不变的状况，构成了文化研究整个发展历程中来回盘旋的一个基调，并与思维方式的承继与转换、外部意义的延展与更新等均有密切的关联。既然如此，对文化定义的确认，也就有必要将探索的视野扩展到更大的区位中，在一更为绵长的历史垂沿线上来追溯其渊源，并给予恰当的定位。

为理解的方便起见，并以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为例，需要首先将“文化”概念的整个流转过程做一统观。在此基础上，也可将文化定义的进程界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由此得出三个有所不同的定义。第一个定义，即在文化研究兴起以前，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化批评”对文化所下的定义；第二个是文化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正式兴起之时，对文化所下的一个新的定义；第三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至今，在引入符号学 / 结构主义之后，对文化所下的又一个定义。本文将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第三个定义的构成上，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此后及今

我们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但从学理探索的角度看，也只有将前两个定义的形成路径讲清楚了，才有可能对第三个定义的崛起及其指意方向有更为深入与合乎逻辑的认识。据此，下文即先梳理有关文化的前两种定义，进而希望在对比中发现第三种定义的构形特点，及其在整个文化研究史上所呈现的意义。

一、“文化”的前两个定义

文化研究创始人雷蒙－威廉斯在 1957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在这本书中，他对“文化”概念在英国的最初塑形有一个系统的解释。在威廉斯看来，英国 19 世纪以来出现的那个带有现代性含义的“文化”概念与当时的两大社会现象有关，一是工业革命，另一个是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既造成了对传统的、有机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的毁坏，也促成了两大阶级的出现，即，一味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和以贫困为标志、缺乏教育与健康保障等的底层劳工阶级。民主革命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程序民主，另一个是大众民主。由于程序民主实际上已为精英集团所控制，大众便只能采取激进的、非程序的方式来对抗社会对之的压迫，传递出自己的声音，其最极端的表现便是法国大革命。就人文主义看来，前面所述的两大革命体现了整个社会向机械论与暴力论发展的趋势，因此，从最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家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开始，就企图以一种精神的价值来对治这种社会的痼疾。这种所谓的精神价值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一般又是以诸如艺术、诗歌、自然、有机、生命、美德、智性、真理、创造力、教养、美的原则、永恒之物、心灵的健康等分散的概念来表述的，而缺乏一个统一的名称。当时，也就是在 1852 年，著名的批评家纽曼 (J. H. Newman) 还曾为此事而满怀期待地说过：“如果英语也像希腊语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简洁、概括的方式来表达心智的 proficiency or perfection

(精通与完美), 那该多好啊!”^① 然而, 这个机会还是出现了, 大约 10 年以后, 另一位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出版了《文化与无政府主义》(*Culture and Anarchy*) 一书, 第一次大量地使用“文化”这一概念, 并以之作为整合上述各种同类体验的一个特定用语, 由此而揭开了英国文化概念史的序幕。

下面可借助直接引用阿诺德在书中的表述, 来窥知其对文化概念的解释。阿诺德这样写道:

Culture which believes in making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 believes in perfection, is the study and pursuit of perfection ...

(文化的信仰是使神的理性与意志通行天下, 是完美, 是对完美的探讨与追求……^②)

I have been trying to show that culture is, or ought to be, the study and pursuit of perfection; and that of perfection as pursued by culture, beauty and intelligence, or, in other words, sweetness and light, are the main characters.

(我一直尝试着去表达, 文化是, 或应当是一种对完美的探讨与追求; 文化所追求的完美, 就是美与智, 或曰甜美与光明, 这是它的主要品格^③。)

由以上可知, 阿诺德对文化的最核心的一个描述语就是“完美”(perfection), 就施动的方式上来看, 文化也就是对完美的探讨与追求, 它是最优秀的自我(best self)通过教化普遍的、普通的自我(ordinary

① J.H.Newman,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1852, p.201.

②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2.

③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8-49.

self) 而获得的。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诺德所集中阐述的这一概念,与其之前早期人文主义所表述的各种理想化内涵是有相通或一致的,其出发点均是希望通过对某种“健康”的心智价值的正面确认,有效地抵御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就此而言,阿诺德的这个文化概念也是带有鲜明的批判主义特征的,它不是一种对客观现象的模拟,而是一种辨识与选择的结果。当然,这个借助对希腊精神的突出强调而演绎出来的世俗化标准,也含有对长期以来支配人们思想的希伯来精神进行有意识抵制的动机。从英国当时的情况看,由于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造成的负面效果,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基督教又重新成为社会民众与知识精英追逐的一个价值来源。当湖畔诗人隐匿于历史背景中之后,在文学家家中,像基布尔(John Keble)、纽曼等开始出场亮相,他们同时也是其时牛津国教运动的领袖,这一思潮在19世纪一直在各种浪潮的中心或边缘活跃,而其后的艾略特则可看作是该观念谱系的一种延伸,他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中塑造一幅完整的救赎画面,也在自己的其他论文中表达了用基督教来统一欧洲文化的宏大愿景。就此,我们也可看出阿诺德的文化概念具有的另一种针对性,代表了另一种思想倾向的运行,就此而言,从另一层面上看,这一概念最终在知识界的流通,似也可看作是“文化”对“宗教”的一种替补性胜利,即以世俗人文主义的“精神”去替代宗教的“精神”。综合这些来看,这也便是威廉斯所谓的普行于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那场“文化革命”。它与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三大革命”^①。

阿诺德之后,文化的这一概念逐渐发展为一种主导态势,同时在1921年由英国英文学会起草,并以政府名义颁发的《纽伯特报告》(*Newbolt Report*)中达至一种高潮性的回响。《纽伯特报告》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在阿诺德的文化概念基础上的,而其论述的特点则是将人文主义理

① “三种革命”的提法见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Introduction”, x.

念与对英文教学的推动联结到一个核心的话题上^①。此后，一般认为能继承阿诺德思想并有所发挥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就是 F.R. 利维斯 (Leavis) 与 T.S. 艾略特 (Eliot)，他们两人都曾撰写了以“文化”这一概念命名的著作，利维斯的最著名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为《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艾略特的书名是《文化定义的札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仅从利维斯的书名就可以看到，他是将少数人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视为多数人或民众拥有的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其所昭示的这个传统后来也被称为是“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也就是以“文化”来抵抗“文明”或现代文明）。但是利维斯的观念也显示出了与阿诺德的一些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利维斯更为突出了英语文学的重要性（而阿诺德则更偏爱于用希腊文与拉丁文书写的古典学），也更偏向于将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代表物，由此而主张在大学中提升英文学院 (*English school*) 的重要性，将英文教学与研究置于所有学科的核心地位^②。

毫无疑问，文化保守主义一系的“文化”概念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而且影响深远。就中国而言，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引入的英文教育与文学批评就曾经受到这一观念的重大影响。另外一个现象是，甚至于目前在中国提到“文化”这一概念时，也会采用与之相同的意义，譬如说“此人有文化，有教养”，等等（当然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也含有类似的含义）。但是如果放到历史的进程中，尤其是当我们将之作为一种判断社会生活的排斥性标准时，也自然会暴露出它的许多不足。也正是如此，当一个新的公民社会开始在战后（“二战”以后）浮现在广阔的地平线上，民众世界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力量的时候，以精神完美为标尺的文化概念就必然会显示出其局限性，以及论述上的无以适从性，需要对其含义进行新的改造，从而也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第二种关于文化的定义，

① 对《纽伯特报告》思想主题的分析可参见 Brian Doyle, *English and Englishness*, Routledge, 1989, pp.41-67.

② 参 F.R. Leavis, *Education & the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

并引发了文化研究的正式出场。

从某种角度上看,文化研究的诞生或第二种文化概念的出现,也与英文学院、英国文学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文化研究早期三大家中的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以及下一阶段的文化研究领袖斯图亚特·霍尔都是从英文系毕业的。从大的方面来讲,文化研究与更早的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上也存在着某种思想上的相通点或接合点,即都是以批判资本所主导的社会为己任的,体现了学院知识人对西方主流社会的批判性与反思性意识。但是既然文化研究属于一种新的言述类型,那么也将有别于阿诺德、利维斯与艾略特等一系的思想,而采取了一种相对有所折中的姿态,以便将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而来的民众社会的维度也一并融入自己的关怀与视野之中,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二者在定义文化上的重大分歧。

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阐释,基于他早期的三个文本,也就是《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长期革命》(*Long Revolution*),它们的解释有所重叠,但又各有偏重。从偏重的方面看,则分别将文化界定为三个义项,这就是,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文化是平常的生活方式(a ordinary way of life)、文化是特殊的生活方式(a particular way of life)^①。其中,生活方式是这个文化定义中的中心词,但通过“整体”、“平常”与“特殊”加以修饰与限定。“整体性”是最重要的,这样也就避免了阿诺德一系将文化仅仅归之于少数人的主观特权(在针尖上的舞蹈),而是将之做了客观化与普泛化的处理。“平常性”指出了文化的日常生活特征,而且举凡如知识生活、精神生活都能被纳入到平常的境界中。“特殊性”是指对文化的考察不能离开特定时间与空间社会群体的具体生活,因此也是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联的。以此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斯这个文化定义所包含的目的,即在于将整个英国社会共同体中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都包括其中,

① 详细的解释可参见黄卓越等著《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页1-39。

为此，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平等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划分出明显的阶级、门第、阶层等差异的社会，这也与其关于“文化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是可互证的。

此后，威廉斯的学生即著名学者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一书中，曾概括过对文化下定义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评述性的定义，另一种是描述性的定义^①。如果以之为参考系的话，大致可以将阿诺德一系的文化定义归入评述性的，而将威廉斯、霍加特一系的文化定义归入描述性的。评述性的定义要回答的是：文化应当是什么？相对而言，描述性的定义偏向于去解答：文化本来是什么？

雷蒙·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重新解释引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文化转向，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定义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当然这些争议主要还是来自于文化研究内部的。概括地说，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威廉斯的定义存在着两大不足：一是，如E.P. 汤普森所说，威廉斯的这个定义还只是一种平面性的概述，没有涉及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也忽视了差异性与动力性的视角。^②第二种批评以为，威廉斯的这个定义并没有标示出“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界限，从而使得所有发生的内容都有可能成为文化。同时，它也很难确认“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界限^③。以此看来，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有明显的过于宽泛之嫌，从而超出了可加辨识的范围。也正因为上面两点理由，似有必要对之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恰恰在这一时刻，文化研究迎来了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时代，由此为第三个文化定义的出场准备了理论上的前提。

①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5。

② E.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I", *New Left Review*, No.9, May-June, 1961, p.26.

③ Tony Bennett,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Culture Studies' and the 'Culture Complex'", 该文为托尼·本内特2005年赴北京语言大学"BLCU 国际文化讲坛"时递交的论文，<http://www.culturalstudies.com.cn>.